

浅析先秦时期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许鸿儒

(青海省西宁市青海师范大学 810000)

摘要: 神意史观与实录精神对立统一下的中国封建史学二重性特征最终构建于班固的《汉书》，但是中国封建史学二重性的发生发展却有着更为古老的来源。我们应该看到早在先秦时期，史官的职能、史家与思想家的诸多著述都对“史学二重性”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后世著史提供了丰富的史学思想的借鉴。

关键词: 史学二重性；先秦史官；先秦史书。

中国封建史学二重性的特征是中国三千多年来史书的基本属性，在中国的史书中，班固的《汉书》是最具有其特征的作品之一，但是其源头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并且有所发展的历史意识的二重性。本文将从先秦史官与先秦史书两个方面出发，来具体分析历史意识二重性与史学二重性在先秦时期的体现，为中国古代史书共有的史学二重性的特征追流溯源。

一、史学二重性

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具体定义为：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历史的结合。“真实的历史”指的是古代的统治者要从历史中吸收经验教训，要求历史的真实，追求实录直书的精神；“虚幻的历史”指的是古代的统治者要求历史著作证明自己的政权是合乎天意的，因此，通过历史作品宣传皇权神授，又会在主观上要求曲解历史。^①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史学的二重性是指史学一方面出于借鉴的需要而从历史的真实中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又要从神意角度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提供论证。^②中国史学的二重性特征，真正完成构建的时期及其作品当属汉代班固所纂的《汉书》，其史学的二重性特征最为显著，这和东汉初年这一特定的时代对于史学的要求以及班固自身的家学渊源有着重大的关联，其中以“宣汉”为旨趣的神意史观与直书不隐，不为汉讳的“实录”精神并存，基本诠释了史学二重性的内涵特征，确为构建史学二重性的定鼎之作。但是，在汉书之前史学二重性的部分特征便已经有所体现。《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中论述：这种史学二重性特征，早在先秦史学形成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来：“董狐笔”和“太史简”便是分别代表了“求道”与“求真”之史学两种不同属性的典型笔法。^③然而对史学二重性影响颇深的历史意识的二重性却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发展中逐渐向史学二重性进行演化。吴怀祺认为历史意识在原始社会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出于维系、发展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现实目的，具有现实经验的成分，包含真实的内容；另一方面，它通过图腾和始祖传说，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一种约束，既提高了氏族成员的信心，又约束成员服从氏族长的管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盘古、女娲等既有人性的一面，又有神性的一面。^④由此可见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着诸多的英雄故事对史学二重性的部分特征已有所体现。而本文讨论的史学二重性即为：神意史观和实录精神的对立统一，以及形成神意史观和实录精神的“敬鬼神”和“重人事”的历史意识的对立统一。

二、先秦史官与“史学二重性”

《吕氏春秋·先知览》中有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由此可见，可能在夏朝时期就已经设立了史官。二十世纪初期，在河南安阳出土的诸多甲骨文中出现了“史”、“作册”、“内史”、“太史”等名称，参诸其他历史文献资料，我国至迟在商朝已设置了史官，当属确定无疑。当时史官的作用大体可以总结为：记事、占卜和祭祀。在商代的基础上，西周王朝建立了更为发达的史官制度。及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然而，“降及战国，史氏无废”，“从横之世，史职犹存”，此时史官制度不仅未被废除，而且在各诸侯国更为普遍地兴建了起来。‘史官本是中央设置，但是在王权衰微的春秋战国时期，史官制度不仅没有没落衰微反而更加的大行其道，其作用也从商朝时的记事、占卜和祭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和史学与历史意识具有的二重性特征密切相关。

首先从各个诸侯国立史官的目的来看，这与他们想努力提高自己的国家的政治地位，进而称雄称霸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

们需要史官来对他们的各种行为进行卜筮占梦来向鬼神询问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史官来记载自己的言行与行事，编修史册，通过实际记录的方式来宣扬自己处事之圣明。前者体现了敬天地鬼神的天命史观，而后者即是史学的实录精神，史学的二重性在设立史官的目的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其次史官在设立的过程中其职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最初的记事、占卜和祭祀的职能之外亦起到了“宣达王命”，提供咨询的作用。吴怀祺参考了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以及刘节所著《中国史学史稿》中的《古代史官表》，加以查缺补漏，并且增加了“活动与表现情况”等栏目制成《春秋战国史官职名及活动一览表》。在表中“活动与表现情况”一栏分为大体上的三个职能，即“与政治有关的方面”，与“史学有关的方面”以及“祭祀、卜筮等方面”。根据此表，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凡表所列七十人，有的人只有单一方面的活动，而有些人却身兼数职，例如楚国的左史倚相不仅负责与政治有关方面的论证咨询，而且还兼任祭祀、卜筮等方面的祭祀一职。但是没有一个史官在任职史学有关方面的记言记事、掌管文献的情况下同时兼任祭祀、卜筮方面的职位。笔者认为，这是诸侯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了史官在任职记言记事、掌管文献的情况下需要“敬鬼神而远之”，不益参与祭祀，占卜等活动，所以导致了竟无一人有此兼职，而这种思想恰恰符合了史学二重性中的求真思想，摒弃鬼神之干扰，以笔实录其事。

最后在统治者注重掌管记言记事与掌管文献史官求真实录的同时，亦是注重史官的祭祀和卜筮这一从商以来的史官原始职责。从表中可知史官亦是多有掌管祭祀、卜筮方面的职能。但是这就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过于重视史官在祭祀、卜筮等方面职能的诸侯国往往多是在诸侯国交战时被吞并的弱国。例如虢、宋、卫等国，当然最重视这一传统职能的还是周王室。相反，设置史官上同时注重三种史官职能的国家都是后来的强国，如：晋、楚、齐、秦等。值得一提的是，最终统一六国的秦国在史官的职能上只设置了与政治有关的方面，这是否与史、卜的彻底分离有关，亦或是和政治的兴亡建立联系呢？此非本文重点，故此不加以深入讨论。

除了史官设立的目的与职能体现了史学二重性的特点之外，先秦史官的史学思想亦是具备鲜明的史学二重性的思想。

其一，先秦史官重人轻神的思想在认同神的存在的基础上也强调了人民的作用。惠王十五年之时，一颗流星落在了虢国莘墟，周惠王问史官原因，史官回答国家的兴起和灭亡之时神灵都会下降，并且建议周惠王去祭祀降下的神灵。这是一种崇信鬼神的神意史观。但是《左传》中又记载了虢国史官史嚣与周惠王内史过对于虢国国君丑笃信神灵一事的看法，即：“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必亡矣，虐而听神”。二位史官都注重人对于历史结果的影响，而非是神，这正是与神意史观相对立的一种对立思想。

其二，如果重人轻神的思想本身还是带有一些的神意史观色彩的话，那么民贵君轻的思想即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这也是不避讳统治者失德的“实录”精神的体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于季氏夺权有一番论述：“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难殄之？”这段论述先是强调了季氏得民心，又表示季氏是比鲁昭公更加优秀的统治者，其判断依据第一是季氏本人勤政为民，第二是民众在季氏的统治之下已经忘却了自己的主君，这段论述以民众的思想出发，对贤臣予以赞扬，

对昏君予以批判。由此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的名贵君轻思想以及先秦史官不为君讳，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

其三，史官对于地理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历史产生的影响的认识带有十分典型的史学二重性的观点。《国语·周语上》中记载了伯阳父对于地震的看法：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1]

伯阳父这段论述，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的神意史观，认为周之将亡是“天之所弃”，阴阳失调的缘故，但另一方面又从自然灾害的角度指出了周之将亡的原因是“水土无演，民乏财用。”此外还以历史的眼光总结了夏、商败亡的经验教训，来推断周之衰亡的原因，这又是从实际与历史真实出发的判断。伯阳父对于周之将亡的原因的阐述正好应和了史学二重性的基本观点。

三、先秦史书与“史学二重性”

先秦史书里的诸多著述都体现了史学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这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神灵观念依然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以《春秋》为代表的诸多史书在史义和史法上已经充分体现了史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功能以及实录精神。此节以《尚书》、《春秋》、《左传》中的具体的章节为依据来讨论这些史书在蕴含着神意史观的同时亦是具有着与之相对的“实录”精神。

《尚书·多士》中有云：

“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伐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2]

这里周公代周王解释了为什么商会被周取代。原因是上天不愿意把天命授予善于说谎和胡作非为的人，上天把丧亡的大祸降临到商的头上，周灭商是在帮助上天行使使命，是上天将灭商的任务交给我们周。这很明显是一种神意史观的体现，用上天、天命意志来诉说周灭商的合理性，进而维护周的正统地位。

在重视上天的意识的同时《尚书》同样重视总结以往真实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尚书·无逸》与《尚书·立政》中举出了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这些贤君的例子来劝谏周成王不要贪图安乐享受，要勤政爱民，体会民间疾苦，对百姓要和蔼恭谨，使百姓安居乐业。周公苦口婆心对周成王的劝谏，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借鉴思想，为后世的政治实践、历史观念、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春秋》的神意史观主要体现在其“灾异必书”上，《春秋·隐公下》记载：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春秋·庄公》又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秋，大水。无麦、苗。

诸如此类的反常的天气以及自然灾害《春秋》都会予以记录。宋朝胡安国有言：

凡灾志，见《春秋》有谨天戒、恤民隐之心，王者之事也。

《春秋》灾异必书，虽不言其事应而事应具有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际，响应之理，则见圣人书之意矣。^[3]

胡安国认为《春秋》记载反常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原因是“明于天人相感之际，响应之理。”即上天会用反常的气象与自然灾害来警告人间，从而劝阻君王、臣子规范行为，不要行不义之事。由此看来《春秋》是具备神意史观的。

《春秋》主在记事，是我国古代记事史书的代表。从《春秋》的史法来看，最重要的是直书其事，符合史书的实录精神。吴怀祺先生在《中国史学思想史（总论·先秦卷）》中认为：“《春秋》把二百多年的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绝不是讴歌封建礼仪道德，相反地，他把臣弑君、子弑父的场景淋漓尽致展现给后世人们。如果不是歪曲《春秋》，那么这部书确实反映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自《春秋》而成的《左传》在前者的基础上记述了不少生动的历史过程和人物活动。这些过程与人物的活动上可以鲜明的看出神意史观的影子，而对于这些活动本事的详细记述又体现了史学本事的实录精神。

在神意史观的体现上，上节所提“莘塬降神”事件更是明确的写出来的确有神，而且真实的降临了，虢国国君丑甚至向神灵祈求

土地。除此之外《左传·昭公》中刘定公评论赵孟一事也颇具神意色彩：

谚所老将知而毫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侂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赵孟不复年矣。神怒，不欲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从，又以年？^[4]

刘定公从神意和民意的双重角度上来对赵孟的思想行为作出了判断，认为赵孟活不过今年，体现了一种人神并重的思想。

《左传》中最能体现实录精神的莫过于“太史简”事件。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5]

史官以生命来确保史书真实性的悍不畏死的精神对后来的史书与史书的撰述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后来两千多年史书实录精神从未断绝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补充

本文通过对先秦史官以及先秦几部史书的探讨与分析，基本得出了在先秦时期，史学就已经产生了二重性的萌芽。虽然这个时候史学二重性的建构还没有完全成熟，严格意义上来说只算得上历史意识的二重性，但从先秦时期著述的时期看来，神意史观对于人的影响逐步的被人所取代，这也是符合历史大势的发展。

先秦时期记述的神鬼之事为后来的史学家在著史时所阐发的天命王权，君权神授等思想提供了思想借鉴，为后来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史书中维护封建统治的神意史观提供了思想源泉。另外先秦的著作也为后来史书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著作所提供的材料，那么后来诸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巨著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注释：

[1]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43页。

[2]何根海、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3]何根海、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4]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176页。

[5]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汇通（先秦史学思想卷）》，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18页。

[6]左丘明：《国语》，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9页。

[7]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3-244页。

[8]胡安国：《春秋传》，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6页。

[9]郭丹译：《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42页。

[10]郭丹译：《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50页。

参考文献：

[1]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2]何根海、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

[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汇通（先秦史学思想卷）》，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

[4]左丘明：《国语》，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

[5]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6]胡安国：《春秋传》，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

[7]郭丹译：《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作者简介：

许鸿儒，1996年4月生，安徽滁州人，青海师范大学在读硕士，曾于2019-2020学年赴北京师范大学进修（联合培养）。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民国史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史相关研究。